

概 论

水目山位于祥云县城东南约 20 千米，是云南开创较早的佛教圣地之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过去鲜为人知。1998 年 10 月 30 日，原省长和志强同志向有关领导及部门提出《关于开发祥云水目山塔林风景区的建议》，指出从昆明至迪庆 800 公里旅游线上，“唯楚雄大理 200 公里之间尚无一个景区”，“开发楚大公路旁的祥云县水目山风景区填补了这个空白，而且有较高的开发价值发展潜力，特建议把祥云水目山塔林风景区作为昆明—滇西旅游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全省旅游景区规划加以开发。”和省长的建议引起省旅游局及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1998 年 11 月 27~29 日，省旅游局组织专家赴水目山进行专题考察，其后祥云县人民政府委托云南民族学院原副院长黄惠焜教授进行《祥云县水目山旅游景区文化软件总策划书》的工作，对水目山景区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委托云南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设计研究院朱良文教授领衔完成了《祥云县水目山旅游景区详细规划》。2000 年 10 月，邵琪伟副省长在视察水目山景区后提出了要进一步深挖水目山景区文化内涵的指示，祥云县政府决定仍由黄惠焜教授负责这项工作，然而黄惠焜教授不幸于 2001 年 1 月 21 日因冠心病突发，抢救无效于成都逝世。我们现在编写这本《水目山志》，是在黄惠焜教授辛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基础上进行的，我们继续了他的工作。

经过编写组近二年的调查、考察，广泛搜集资料 and 进行综合

研究，我们认为水目山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其主要特色是：历史悠久，在云南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名人辈出，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塔林奇观，文物古迹遗存丰富；古木参天，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并重。本书将全面介绍这方面的具体内容。现综述有关问题论证如下：

一、关于水目寺建寺的年代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反映在各个领域，即使在宗教领域也不例外。云南少数民族广泛信仰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原始宗教，而在佛教领域云南是我国惟一个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三者并存的省份。汉传佛教传入云南约始于唐代中期，黄惠焜教授专门写过论文，也为学术界多数学者认可。从考古资料来看，迄今为止云南最早有文字依据的佛教造像，位于安宁市鸣矣河乡小石庄村西的王仁求碑的碑额上刻有佛像一龕，龕内刻有两尊坐佛像，该碑立于唐武则天执政时的圣历元年（698）；其次是1990年巍山县文物管理所在庙街乡垅圩村北垅圩图山寺院遗址中清理出土的一批石刻造像。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何恩之、台湾故宫博物院李玉珉等教授鉴定，认为是唐代的造像，其中还有早于唐代的因素。

然而南诏国立国之初，从宗教信仰角度看，作为南诏统治民族的“乌蛮”，更多信奉的是铁柱崇拜等原始宗教而不是佛教，甚至道教的前身五斗米教——天师道，在大理的流传也要强于佛教。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在《南诏史略论》^①中指出：“南诏文化上有一个问题比较费解，即是南诏崇信三官”。向达先生介绍了贞元十年（794）南诏王与唐剑南西川节度使崔佐时在苍山会盟

^①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155页，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

时的盟誓方式是：“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其后即将誓文一本请节度史巡官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藏于南诏府库。与此同时，还有南诏初不尊孔儒而信书圣王羲之的记载。向达教授认为：“南诏王之所以信奉天师道，因为这原来是氏族和羌族的本身信仰”；“王羲之是天师道世家，有书圣之称，自是天师道之名人”。

以上我们介绍南诏国初期的时代背景，主要是想阐明的是：尽管佛教传入云南约始于唐代中期，但当初以彝族和白族为主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更多的是崇尚武功，在上层建筑领域更多的是承袭本民族的东西。然而约从9世纪初起，南诏进入极盛之时，其版图所及北抵今大渡河，与唐以一衣带水为界，其兵力东边达到今贵州的遵义和广西的西部，南方的今越南、泰国，西方的今缅甸，三个国家的部分地域俱曾一度为南诏所征服，自8世纪中至9世纪末，俨然为东南亚的一个大国，与吐蕃一起同为唐室的心腹之患。在疆土基本稳定之后，南诏统治者开始由战争转向国内的建设，而佛教的大力弘扬正适应了当时的形势。

从《南诏野史》等文献记载看，记录南诏建庙的记载主要有：唐开元二年（714）“立土主庙”。（注：当为巍宝山上的巡山殿，祀细奴逻为土主）；唐开元十四年（726）“立庙祀晋右将军王羲之为圣人”，唐大历十二年（778）“建观音寺于白崖”；唐贞元十九年（802）“王封云南金马碧鸡二山之神，为景帝建妙音寺塔”；唐元和五年（810）“（劝龙晟）铸佛三尊送佛顶寺，用金三千两”；唐太和三年（829）“是年僧梦岛造永昌卧佛”，唐开成元年（836）“嵯颠建大理崇圣寺，基周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

塔”。^① 崇圣寺的建立可以看作南诏国大力弘扬佛教的标志，崇圣寺在南诏、大理国统治近五百多年内成为皇室的中心寺院，滇西的佛教中心。

祥云水目山在滇西佛教中虽然不可能像有大理崇圣寺那样重要的地位，但水目寺的建立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同时在宗教史上与崇圣寺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

从现存史料看，水目寺始建的年代有两种不同说法，即“蒙时说”（建于南诏时期）和“段时说”（建于大理国时期）。蒙时说主要见于碑记：明天顺七年（1463）杨寿撰书的《水目寺碑铭》曰：“盖水目山者，龙兴四年甲午，乃普济祖师之所作也”。龙兴，为南诏国劝龙晟年号，龙兴四年当为公元813年（按干支纪年法甲午年当为814年）；其后清康熙九年（1670）立，李元阳撰书的《水目寺诸祖缘起碑》沿用了南诏龙兴四年建寺的说法，该碑在叙述始祖普济庆光禅师文中有：“时唐宪宗元和八年，为诸大臣请建此刹，师涌泉清莹，因名水目”。唐宪宗元和八年为唐代的纪年，即由南诏国龙兴四年换算而来，当为公元813年。

段时说则主要见诸于文献：首先见于明代李元阳所纂编的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寺观中水目寺条曰：“在水目山麓，段氏时杨普济经始，洪武二十四年（1391）僧智圆成立。旧有白虎窝、黄龙木犬之异，至今遗址尚存，世传有贵客至则木犬预吠”。其次为释圆鼎所撰《滇释纪》：“普济庆光禅师，姚安人，杨氏子，初开妙光寺，次同净妙禅师开水目山。山昔无泉，师以杖卓之，泉随涌出，世谓卓锡泉，因名水目，遂开堂弘法，时诸王大夫，咸往皈依，四众钦崇，后入寂东山，建塔水目，段氏赠为普济庆光禅师”。

^① 云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诏大理文物》第204、213页《南诏大理大事记》，文物出版社1992年出版。

无独有偶，南诏国有个“龙兴”年号，而大理国段正兴时也有个龙兴年号，然大理国龙兴四年当为宋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明代有位编纂《云南通志》的李元阳，清代有个撰写《水目寺诸祖缘起碑》的李元阳。

这两种不同建寺年代的说法相差346年之久，目前我们在没有找到更有力的资料之前，学术界也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赞同蒙氏说的学者认为：佛教传入云南最早并非是密宗而是汉传佛教，其时在天宝战争之前，水目寺始建于唐宪宗元和八年有明确的碑文记载，而从干支纪年看，龙兴四年甲午，当属蒙氏时的龙兴四年，而不属于段氏时的龙兴四年。而认同段氏说的学者其论据有三：

1. 按水目山《渊公碑》所记：“其家谱宗系者，自观音传于施氏，施氏传于道悟国师，道悟传至玄凝，玄凝传于公，公之族子有慧辩”。其所记宗系，按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施头陀…宗家以为得观音圆通心印，施传道悟，再传玄凝，玄凝传凝真，自施头陀至真皆住崇圣寺”。由此可见水目山的佛传宗系派生于大理崇圣寺。崇圣寺道悟国师既是普济的师尊，同时也是玄凝禅师的师尊，因此净妙、皎渊为道悟的再传弟子，普济禅师乃净妙、皎渊的师叔，而净妙、皎渊的生卒年代非常明确，为公元1133~1211年及1149~1214年，如果他们在佛教法嗣方面无误的话，那末段氏说则更为可靠一些。

2. 从水目山现存宗教建筑及文物来看，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水目山塔为大理国时的密檐方塔；已毁的中塔塔砖为大理国时的塔砖，北岗塔林第40号僧塔出土的三个黑陶骨灰罐，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确认为大理国时的文物；其中一件为国家一级文物，北岗塔林中惟一尊单层亭阁式方塔亦为大理国时的造型；再加上已经找到的《渊公碑》残段，有大量的大理国时的物证，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任何南诏国的文物依据，也

没有任何从公元 813 至 1159 年三百多年间有关水目山建寺和僧侣情况的记载。

3. “蒙氏说”与“段氏说”出自明清两个同名的李元阳的记载，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明代的李元阳（1497～1589）字仁辅，号中溪，大理人，白族，曾官司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荆州知府等，著有《李中溪全集》，编纂《云南通志》，是云南著名学者，一生除从政外，曾致力于佛教的弘传，从大理崇圣寺三塔北塔的重修碑记看，他还曾捐资主持过三塔的维修，应该说对当时的宗教寺观有较多的了解。而撰写《水目山诸祖缘起碑》的李元阳，则为清康熙年间任职督理云南通省清军民屯粮储管水利道按察副使，在游览水目山过程中与非相禅师交谈而写的碑文，我们从史料来源的选择上，更应看重于时代较早的明万历《云南通志》的记载。

尽管水目山建寺的年代存在南诏与大理两种不同时代的说法，但从现存全省宗教寺观中看，均属于建寺较早的宗教寺院之一。

二、关于水目寺为滇西汉传佛教禅宗的传布中心

弘传云南佛教的源流与教派，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老一代史学家基本有两种看法：一位是陈垣教授，在其《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曰：“其始自西传入，多属密教，其继自东传入，遂广有诸宗”；另一位是方国瑜教授在《新纂云南通志》卷 102，佛教 2 中提出：“…自中土、印度二路并有传播佛法于云南之说似并可信，然主流则来自内地”。两位前辈代表了 20 世纪中的说法，而经过近 30 年的工作，我们对佛教传入云南的历史有了更为具体和明确的认识。

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密宗阿吒力教，相传始祖

为印度僧人赞陀崛多。圆鼎《滇释记》曰：“赞陀崛多尊者又云室利达多，西域人也，自摩伽陀国来，又号摩伽陀，游化诸国……阐瑜伽法，传阿吒力教”。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曰：“赞陀崛多神僧，蒙保和十六年自西域摩伽国来”，当为公元840年。不久赞陀崛多被南诏王尊为国师。为什么南诏时那么容易接受来自印度的佛教呢？其原因一是传布佛法密教只是采用符咒的方式，也就是背诵佛教经典的语录即可，无需直接弘传三藏佛典的原文，易为汉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南诏统治者所接受；二是密宗阿吒力教的阿吒力僧为有室僧，在戒律方面并不严格；三是阿吒力教与当地民族的祖先崇拜相结合，易为当地民众所接受。

而从内地传入云南的佛教，则为地道的大乘佛教显宗。从现有考古资料看，巍山垅圩图山寺院遗址出土的石刻造像，其中不带密宗的因素，而年代则要在密宗阿吒力教传入之前。而从1978年在维修大理三塔时发现的塔藏文物来分析，除发现大量密宗的东西外，也有反映内地华严宗、禅宗等汉传佛教的内容。^①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追述一下禅宗传入云南的历史。过去最为流行的说法是云南禅宗始自元代，昆明筇竹寺的洪镜雄辩法师。其说来源于明宣德九年（1434）郭文撰书的《重修玉案山筇竹寺记》，其后弟子无照玄鉴禅师又创太华寺。但实际上这里说明的只能是禅宗传入昆明的历史，而不是整个云南的历史，禅宗传入云南应始于南诏时期，至大理国时得到了发展。而祥云水目寺就是宋代滇西禅宗寺院的中心。

首先，禅宗传入滇西，始于9世纪初崇圣寺创建时期，其依据有二：

^①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与清理》，《考古学报》1981年2期245页。

1. 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教授 1978 年发表的《大理崇圣寺塔考说》一文，考证了开成年间定立三塔的李贤者即为买顺禅师。^① 据圆鼎《滇释记》：买顺游方，谒天皇悟和尚（禅宗南岳二世）参百丈（怀海禅师）、南泉（普愿禅师）”。此三人在中唐时均为南岳一世马祖道一的弟子。因而方先生认为“李贤者买顺，传授禅宗于大理、兴寺、建塔，南诏成王（丰佑）时也”。丰佑在位时间为公元 824～859 年。

2. 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简称《张胜温画卷》）是一件极为珍贵的大理国文物。画作于公元 1172～1180 年。其中自第 42～57 页绘禅宗南宗的祖师像，依次为第 42 页绘迦叶尊者，为禅宗西天初祖；第 43 页画西天二祖尊者阿难；第 44 页绘达摩大师，在禅宗传灯系统中，列为西天二十八祖，又为东土的初祖；第 45 页绘东土二祖慧可大师；第 46 页画僧璨大师；第 47 页画道信大师；第 48 页画弘忍大师；第 49 页画慧能大师；第 50 页绘神会大师，神会是禅宗荷泽派的创始人，荷泽派的弟子尊神会为中原禅宗的七祖；第 50 页绘和尚张惟忠。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曰：“张惟忠，得达摩西来之旨，承荷泽之派”；第 51 页绘贤者买顺禅师。这里清楚地描述了禅宗传入云南大理的历史。据台湾著名佛学专家李玉珉教授考证，和尚张惟忠，本荊州人，在成都圣寿寺传法，并在圣寿寺圆寂，故有人又称他为“益州南印”，他是神会大师的再传弟子，而李贤者买顺则是由南诏国送往成都学习的质子。由于唐节度使韦皋（745～805）是一位禅宗的信徒，且与神会的弟子接触，质子之一的李贤者买顺成为了和尚张惟忠的禅宗传人^②。

① 方国瑜《大理崇圣寺塔考说》，见《思想战线》1978 年第 6 期。

② 李玉珉《梵像卷释迦佛会、罗汉及祖师像之研究》，刊《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台湾故宫博物院 1992 年出版。

上述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禅宗传入云南始于南诏，但由于南诏国王又奉密宗阿吒力教的创始人赞吒崛多为国师，禅宗并没有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至大理国时期，经道悟、玄凝等崇圣寺主持的倡导，和中原地区大量佛教经典籍的流入，禅宗在云南的发展具备了条件。由于当时崇圣寺依然是皇家寺院，密宗阿吒力教的统治中心，而从大理国高氏倡导佛法起，则将禅宗的传布中心由崇圣寺中分出，转移至祥云水目寺。

正如《渊公碑》中所载利贞皇叔对皎渊说的一段话，说得很清楚：“达摩西来之□，祖祖相传，灯灯起焰，自汉暨于南国，代不失人”，达摩西来之说正是《大理国张胜温画卷》图载的汉传佛教禅宗荷泽派的学说。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仙释张惟忠条曰：“得达摩西来之旨，承荷泽之派，为云南五祖之宗”。水目三祖，普济、净妙与皎渊，均拜大理崇圣寺主持道悟或玄凝为师，但又都离崇圣寺而来水目寺，其原因显然是崇圣寺仍然还是密宗阿吒力教的统治中心。而他们三人的尊师道悟与玄凝，万历《云南通志》载曰：“道悟国师以定慧为禅家所宗”、“玄凝宗师日以写经为课，笔法尝如神助，浑洒，须臾便能累纸，坐化之日计平生手书经藏多至万卷”。道悟与玄凝尽管身在崇圣寺，但实际均已为汉传佛教禅宗的传人。

自元世祖忽必烈灭大理国之后，云南行中书省的建立使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转移至当时的省会中庆城，即现今的昆明市。在宗教领域，原来南诏、大理国弘扬的阿吒力教进一步为汉传佛教所代替，从元代开始，禅宗的中心，亦由滇西转移至昆明，元代昆明的筇竹寺住持洪镜雄辩禅师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成为云南佛教的主流派。而滇西的佛教包括水目寺在内则处于衰落的时期。直至元末明初，晋宁盘龙祖师崇照遵其师空庵禅师的嘱咐，在后期开始了中兴滇西禅宗之举。

据元宣光三年（1372）庆源撰《大盘龙庵大觉禅师宝云塔

铭》记载，大觉禅师崇照，俗姓段，昆明晋宁人，为大理国白选官之后裔，年幼丧母，29岁丧父后出家，拜昆阳普照山大休禅师高弟云峰和尚为师，讳崇照，号莲峰，其后筑庵于今晋宁和衲山。自至正元年（1341）云游中原各地历七载，参谒空庵、檀芳等十八大师，后经重庆回至昆明，创盘龙庵。成为元末明初中兴禅宗的大师，后还住圆通寺4年。后遂空庵师的嘱咐，决心将中兴禅宗的目标移向了滇西，其先后在禄丰县黑井镇结庵二年，今莲峰庵遗址及碑文犹在，后住大理崇圣寺，应元平参政事段敏斋及品甸（今祥云）大王宝花之请，来到祥云水目山，经二年，至正二十四年（1364）因病由水目山回晋宁盘龙寺，于当年八月十八日圆寂。去世之前交待其徒净庵留驻水目山，另一弟子慧堂主持盘龙寺。弟子慧堂等按佛教禅宗礼制，将崇照大师坐化之真身，奉于舍利塔中。舍利塔位于盘龙庵后。

据张琦娟编著的《千年古刹盘龙寺》所载，至清咸丰十年（1860）大师遗体受兵灾，被焚烧于晋城如意宫。崇照大师像重塑于今盘龙祖师殿。崇照一生广为云南佛教信徒的尊重，是与他一生执戒苦行，奋斗一生的经历有关。目前晋宁盘龙寺是云南香火最旺的寺院。从他圆寂之前的安排看，可以旁证祥云水目山在云南佛教丛林中的重要地位。

水目山历代高僧相承不绝，最为突出的是两个时期，一是开创之初的大理国时期，自普济庆光建寺之后，曾任大理国相国中国公的净妙及相国高量成的儿子高成宗相继出家入寺为僧，被奉为水目寺开山诸祖中的二祖及三祖，集中反映了大理国高氏倡导佛法的历史；另一时期为明末清初时期，当时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代，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冲击封建桎梏的局限；在思想学术方面也是一个对传统进行挑战的动荡时期，当时在云南姚安出任知府的李贽，和姚州社会名士陶珽当时就是向封建礼教进行挑战的进步思想家的代表。由于许多士大夫阶层中的知识分

子鉴于对仕途的丧失信心，而产生当时社会特有的“逃禅”现象，即当时不少社会名人以遁入佛门来寻找自己的出路。祥云水目寺明末从彻庸禅师起，历无住禅师、非相禅师诸祖，形成“四方云衲，请受皈戒者，骈集其中”、“万众皈依、千衲绕围、从者如云”的繁荣局面。

彻庸禅师（1591～1641），俗姓杜，名杜初，云南县（祥云）海稍人。年十一入鸡山礼大觉寺遍周为师，初传为禅宗中的曹洞宗。他离开鸡山后，偕徒洪如（无住禅师）入牟定白云窝开创化佛山丛林，天启六年（1626）创妙峰山德云寺（今大姚县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形成滇西曹洞宗传布中心。崇祯七年（1634）偕徒洪如出游浙江太白山天童寺，参密云大师。嗣法临济宗第三十五世。《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载：“滇南自古庭后二百余年，祖灯再焰，实从斯始”。所著有《曹溪一滴》、《谷响集》、《径石滴乳集》等。自彻庸起，滇西禅宗进入临济、曹洞二宗相举并重的时期。

无住禅师（1589～1664），俗姓邓，定远县人（今牟定县），28岁出家，先参禄丰青莲寺大千师剃度，后礼鸡足山大觉寺彻庸为师，承曹洞宗少林福裕禅师七十宗法派之第十二世，从此建立与彻庸形影不离的师徒关系，自参浙江天童山密云禅师后，嗣临济宗第三十六世。崇祯十二年（1639），离开彻庸入驻水目山水目寺，始建水目山顶的宝华禅寺。据《启建宝华庵碑记》在无住主持水目山丛林期间，“开堂选佛十余处，是时，四方云衲，请受皈戒者，骈集其中，因颜之曰戒堂。”他广收门徒，其中包括水目寺六祖非相普行禅师和誉为云南诗书画三圣的担当和尚普荷等。

无住一生著作甚多，据《无住洪禅师塔铭》记载，有《空明集》、《苍山集》、《室中问答》、《指颂举古》、《鸡山语录》等书行世。同时无住一生交往甚广，徐霞客滇游期间专门至水目旧寺拜

访无住，同时他与当代名儒陈继儒，画家董其昌，大姚县令黄孔昭等有密切交往，开创了佛儒交融的格局。

非相禅师（1608～1690），俗姓孙，景东县人，15岁出家，投鸡足山云溪庵德同大师，崇祯十年（1637）改投无住禅师，侍无住师宝华禅林达27年。清康熙三年（1664）无住圆寂前，授非相为曹洞宗第十三世，临济宗第三十七世，主持水目山佛事。康熙七年（1668）初于宝林禅林开堂授戒，继而赴本山普贤寺、大姚德云寺、牟定化佛山、禄丰黑井万春山、鹤庆龙华寺、大理文殊寺等处弘法，以水目寺为基础，将禅宗学说扩展到滇西各地。清释同揆著《洱海丛谈》记曰：“水目山，有非相大师，年八十，修建梵宇数百间，剃度弟子万余人，迤西僧徒皆其眷属，亦说戒参禅，滇南法席之盛，无过于此。”

从彻庸起至非相止，弘传的均为汉传佛教的禅宗系统，则是明显的事实，由于彻庸、无住及非相在水目山宝华山开堂选佛，广收门徒，又重新恢复了水目山滇西禅宗的中心地位。

三、关于以担当和尚为代表的“释子艺术”

明末清初，水目山产生过一批通诗、书、画的名人高僧，除彻庸、无住本人外，还有担当、知空等人。云南著名考古学家孙太初先生所著《鸭池梦痕》一书^①，专门写有《明末滇僧书画》一文，介绍这一方面的成就。其文曰：“晚明之际，滇南高僧辈出，崇尚诗文书画，对发展云南的文学艺术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究其原因，一是受到自南诏、大理国以来释门中深厚的文学涵养的影响；二是当中原鼎革之时，云南一隅犹为南明朝廷所据，一批不愿觐颜新朝的大臣和有气节的知识分子流播入滇，云

^① 孙太初《鸭池梦痕》第15～1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南一时成了文人荟萃之地。及至永历帝出亡，许多遗臣文士又遁逃空门，以躲避清朝的迫害。他们虽然已经出世，但并不能从此解脱，故国河山之思，黍离麦秀之感，都寄托于诗文书画中，形成别具风格的释子艺术。”

这里需要特别介绍一下无住的弟子担当和尚普荷。普荷，俗名唐泰（1593～1673）字大来，晋宁县人，祖上是浙江淳安人，祖父名尧官，为嘉靖辛酉解元，著有《五龙山人诗文集》传世；父亲世修，号十海，以万历癸卯举人而仕临洮同知，著有《十海诗集》，唐泰从小便受古典文化的熏陶，5岁就受祖父的启蒙，10岁已能诗文。后来成为云南一枝独秀的诗人和画家。他的诗集《邈园集》和《概庵草》已难见到，但李根源先生于1900年即收集了他的诗作177首以《明义僧担当公遗诗》名出版。而他的书画作品，建国以来云南省博物馆已经两次出版了担当的书画集，他在诗文、书画领域中的成就，与徐霞客在地理学、文学方面的创见有异曲同工之妙。唐泰年轻时曾游学于内地，游学期间曾拜董其昌为师，与陈继儒等泰州学派名士也有交往，徐霞客游滇时，就是通过他的介绍与唐泰相识。唐泰37岁时（1630）即参会稽显圣寺云门禅师，但又念老母在堂，故未曾披薙。直到崇祯十二年（1639），其母去世4年，辞别徐霞客一年之后，至水目山参无住禅师受戒出家，法号普荷。其后又赴鸡足山，改号通荷，清康熙十二年（1673）圆寂于大理感通寺。享年81岁。

四、关于水目山塔林在全国同类古迹中的地位

水目山历史悠久，高僧辈出，遗留文物古迹必然丰富，但经“文革”期间的浩劫，寺院建筑大多损毁，后经努力恢复，仍不失名寺古刹风貌，尤以塔林、碑刻和寺院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水目山塔林共计81座，由北岗塔林、水目寺僧塔、宝华寺僧塔

三部分组成，以北岗塔林规模最大。

北岗塔林位于水目寺北 0.5 千米的山岗上，在东西长 268 米，南北宽 36 米的范围内，现存各类僧人墓塔 59 座，僧人墓葬 10 座。约始建于大理国时期，一直沿续至清代早期（公元 13 ~ 17 世纪）为水目寺及水目山诸寺僧人的公共墓地。

从北岗塔林的造型看，有亭阁式单檐方塔及覆钵式塔两种。通高 1.8 ~ 6.2 米不等。其中第 31 号塔为云南惟一保存的亭阁式单檐方塔，从塔形、用砖及砌筑方法看，可以定为大理国时的建筑。其余均为覆钵式塔，分砖塔与石塔两种，其构造一般由塔刹、塔身、须弥座和地宫四部分组成，以其造型优美、雕刻精细而著称。其中地宫为皮藏比丘、比丘尼骨灰罐的地方，因而这类塔一般又称和尚塔。地宫又可分单体与群体两种。本次维修已将 2 个皮藏群体骨灰罐的第 34、40 号塔的地宫修筑地下通道，第 40 号塔皮藏骨灰罐达 211 个，其中一件造型精致的黑陶罐，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大理国时的遗物，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第 40 号塔造型古朴也可以确定为大理国时所建。据《水目山诸祖缘起碑》大理国净妙与皎渊圆寂后均葬于北岗。其余僧塔大多属明清时期的遗物。

2001 年 9 月课题组组织赴全国同类性质塔林进行考察，其结论是水目山塔林，从文物价值和数量等方面看，可名列全国第三，是我国南方的第一塔林。如果我们提出：“北有少林寺，南看水目山”^① 的旅游品牌，一点也不为过。

^① “少林”，指河南省登封市少林寺塔林，现存僧塔 268 座，为全国之最；另一规模第二的是山东省长清县灵岩寺，现存僧塔 160 余座。而位于宁夏青铜峡市的“一百零八塔”，则属于藏传佛教的经塔，其性质与僧塔不同。而河南汝州风穴寺塔林数目与水目山相当，但其中夹杂部分近、现代所修僧塔。

第一章 山川形胜篇

第一节 自然地理

水目山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西南隅，坐落在广大铁路和 320 国道旁。通往景区的旅游公路与之相连，东距昆明市 280 千米，西离大理市约 70 千米，距祥云城约 20 多千米。

水目山地处扬子准地台的西侧，在川滇经向构造体系和青藏高原滇缅“歹”字型构造体系的复合部，并在洱海深大断裂和程海深大断裂（宾川大断裂）的下盘，是金沙江水系天马河与红河水系大三村河的分水岭。地质构造属剥蚀中山地貌，为古生代海相沉积发育地区。出落地层为古生界泥盆系莲花曲组（D、L）地层和华山西期的侵入火成岩（ r_4^3 ）。莲花曲组地层在整个山脉中均有分布，岩性为灰黑色泥灰页岩夹生角砾状灰岩，岩溶裂隙发育不均匀，需水性弱。华山西期侵入火成岩主要分布在山顶和山麓西侧，岩性为辉长岩，以岩体和岩脉产出，分布零星，岩石坚硬，需水性弱，仅含少量裂隙水。整个山体长约 11 千米，宽约 8.5 千米，总面积约 9350 公顷。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西北高，东南低，西北延伸为中岭岗、老尖山、大风丫口，西南支脉为弥渡乱洞山，南走为金鸡庙山。

水目山是祥云和弥渡两县的交界山。《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五载此山的走向是“大脊自九鼎山南下，至洱海卫城南清华洞东度，又耸而南为水目山，其南又联为天华山，即云南川南兜之山也。”其海拔高度在祥云境内为 2000 ~ 2627 米，相对高差 627 米。

水目山属北亚热带偏北气候，具有冬干夏湿、寒暑无异、四时皆春的高原季风气候的特点。杨升庵曾有诗云：“天气浑如三月里，风花不断四时春”。一年四季，气候温和，花木繁青。但干湿季分明，昼夜温差大，并有“四时皆春，一雨成冬”的特征。约 5 年左右，间或有一次降雪。全年日照时数为 2323 小时，太阳总辐射每平方厘米 14192 卡。海拔 2000 米的水平地带，年平均气温 14.7℃，极端最高气温 31.5℃，极端最低气温 -6.5℃，年平均降雨量 810 毫米。海拔每升高 100 米气温平均递减 0.56℃，年平均降雨量递增 25.7 ~ 66.5 毫米。这里，5 ~ 11 月为雨季，11 月至翌年 4 月为旱季。全年多为西南风，7、8 月时有东风、东北风。平均相对湿度为 68%，平均绝对湿度为 11.5 毫巴。

由于以上综合原因，水目山相对湿润凉爽，不仅有利于林木生长，而且为旅游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先天的优势。其气候特征和土壤地质状况，为植物区系的演化和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造就了植物的多样性和乔木灌木共繁共荣的独特的森林景观。加之政府、林业及各有关部门不懈地努力和有效地管理，水目山至今保留着数量众多、年代久远的阔针叶林，乔灌共生，茂密蓊荫，森林覆盖率达 80%，并以其幽秀绵亘的莽莽林海与长达 17 公里的大龙潭、清水沟、文笔山、清华洞景区相连，1992 年经国家林业部批准，被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水目山原称宝华山，因佛教圣地的开创而改名，形家言其像一尊结跏趺坐的弥勒大佛。李元阳撰写的《水目寺诸祖缘起碑

记》中云：“对山遥睹，巍然弥勒趺坐原野，近瞻宛尔宝莲千叶。左有云驿象山卫俯回顾，右有天华狮山护伏频呻，辅弼随龙蟠虎踞。”山势“嵯峨绵亘，谷峻溪深，林木幽秀，梦宫辉煌”（民国《地方志》）。“前则平原浩瀚，云霞之所沃荡，后则群峰削成，日月之所迴薄。雕扉曲砌，下映林皋，金碧璇题，上凌霄汉。”（乾隆《云南县志》）。

第二节 森林植被

水目山面积虽然不大，但植物种类多样，森林树种古老，还有名花奇木，为了加强林木的保护管理，早已建立水目山自然保护区。据初步调查，已知木本植物 47 科 88 属 135 余种，草本植物 16 科 30 属 30 种。

一、森林类型划分

为了合理经营管理水目山的森林，有必要进行森林植被分类，分类方法可以是人为的，也可以是自然的。要充分反映事物的自然性状和内在联系，采用自然分类较好。根据林分林木的特征来划分森林，则更接近于自然的分类。

在森林分类时，所依据的特征，主要包括有林木组成、林木生态外貌、动态和地理分布等几个方面。参照云南森林分类，主要采取森林生态外貌的原则和主林层优势树种的原则。在环境条件（主要是气候条件）相近的不同地区，森林的外貌和结构是相似的。因为森林中的各种植物的生活型组成基本上是一致的，对森林生态外貌起决定意义的正是上部的林层。也就是说上部的林